

关于“富人治村”的辩证理解及其思考^{*①}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富人治村”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的层面,缺乏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其实,“富人”完全可以治村,但却不能将之变成一种模式进行推广;政府可以放权而让村民自治,但必须对“富人治村”进行有效的规制。“富人”可利用自己的优势争取民意,但决不能随意地绑架民意。“富人治村”的落脚点应放在科学化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上。

关键词: 富人治村;辩证思维;政府规制;科学管理;公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2)05-0088-07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增长,于是“富人参政”便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就乡村治理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富人治村”开始出现;而进入新世纪,“富人治村”已成规模;近些年,“富人治村”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较为广泛、全面而又深入的研讨,其成果也是相当丰硕的。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对于“富人治村”的探讨有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现象评说大于学理分析,个体关注多于整体把握,情绪化臧否先于理性探讨,原因剖析重于对策观照,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辩证的思维,不能给“富人治村”以科学的理解和思考,这就必然造成研究的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使乡村治理深陷难以自拔的困境。^②

一、“富人治村”不应成为一种模式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现在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崛起、发展和壮大,它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也不应忽略的一支生力军。在广大的中国农村

也是如此,那些先富者尤其是私人企业主越来越以其经济实力占据主动地位,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将富人排除在外,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不明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让“富人”怎样“治村”,如何理解“富人”在村庄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尤其是要摆正“富人”与乡村政治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首先,我不赞同对“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和做法,更不赞成由此而形成的“嫉富”和“仇富”心理与行为,因为这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准则相背离的,也是阶级论思维的惯性发展和延续。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一股经济力量,先富群体不论是对于中国经济还是社会生活都起到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如果将其与“政治参与”完全分离甚至割开,那就既不合理,也很不科学了。也是在此意义上,我赞成“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的尝试和做法,因为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和作用:第一,强化和壮大我国,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村的经济功能和实力,进一步达到富国安民的伟大战略目标。众

* 收稿日期:2012-07-28

作者简介:赵秀玲(1963—),女,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YZD2011—16)的阶段性成果。

②如有人就有这样的题目《富人参政有利无弊》(侯明清,《财经文摘》2003年第1期)、《警惕富翁治村消解法制力量》(郭松民,《潇湘晨报》2006年2月22日)。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就可见其情绪化的单向度选择,这是属于两极化的简单判断和思维。

所周知,近现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穷民贫,尤其是中国的广大乡村经济凋零、积贫难返,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要全力以赴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因。如晏阳初指出“愚穷弱私”是中华民族的四大病源,所以要重视乡村教育,搞“整个的(乡村)建设”。他说“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具体言之,“欲去除一般人的愚昧,而启发其智慧,所以有文艺教育以培养‘知识力’。嗣后感觉人民之‘愚’与‘穷’有莫大之关系,且人民之愚尚能苟延残喘,穷则朝不保夕,乃又有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后又感觉人民体弱多病而死亡率高,实为民族前途之忧,乃又有卫生教育以培养‘强健力’。同时感到一般人民自私心重,因之生活散漫,不能精诚团结,于是又有公民教育以培养‘团结力’。所谓四大教育,实为根据实际生活之要求,逐渐演进而创出之新民教育内容之荦荦大端。”^[1](P247-3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开始走出了经济发展的困局,以令世界瞩目的姿态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先进国家的农村相比,尤其是站在更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不少贫穷村庄来看,发展中国乡村经济仍然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发展农村经济、提高乡村的经济实力,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这就决定了重视“富人”尤其是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相当急迫和非常必要的。因此,让“富人参政”包括“富人治村”,一可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力量,为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物质资源;二可发挥其先进的经济管理机制,增强乡村经济发展的制动力;三可调动其广泛的人脉,拓展乡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四可利用其创造性思维,提升乡村经济发展的超前意识和竞争能力。第二,为中国政治尤其是乡村政治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撬动政治板块的坚硬和呆板部分。一般人总认为,让经济精英参政、议政和为政,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两个

界限分明的领域和行为。从某些方面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不少经济精英也都具有政治才能,更何况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又并非绝缘,而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呢?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经济交往与谈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协商与妥协,而如果一个经济精英能将之用于政治生活,那就会获得现代的意识与方法,使政治竞争、敌对情绪化之于无形。这恐怕也是经济谈判与民主政治协商的相通之处。亨德里克斯曾指出“协商民主的观念,即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进行决策,代表了民主理论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2](P1)

显然,这与经济谈判是有相通之处的。又如经济生活中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也可化为一个政治团体及其村庄政治的内动力,培养其成员与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内在的、智慧的转换。某种程度上说,从政治角度难以或无法解决的乡村治理问题,或许从经济角度通过转化的方式能更好地得以处理和解决,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三,克服因贫富不均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动荡,使广大人民群众互通、互信、互助、互爱,这是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在较长时间内,富者与贫者之间是缺乏沟通的,有的甚至能产生相当大的鸿沟和隔膜,通过富人参政、议政、执政,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通过村民选举的方式实行这一办法,可在贫富之间架起桥梁,当富者可以将自己的财富反哺乡村,并真诚地帮助农民致富,当贫者可与富者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个由贫富形成的森严壁垒的乡村社会就可渐渐得到松动和改善,我们的国家、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就会变得和谐安宁。这可能是“富人参政”、“富人治村”最理想的状态和境界。也是在此意义上,“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有其价值与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赞成对“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大加赞赏、无限拔高,并将之视为一个可以普及的实用模式,甚至看成是中国及其乡村治理的必由之路。如有人这样认为“就乡村直选层次而言,‘富人参政’目前依然值得肯定。”“‘富人’当选‘村官’应该是‘多赢’之举。对于村民而言,‘富人参政’能够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收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人参政’简直就是治疗乡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问题的良药,政府主

管官员们自然乐得让富人们竞选村官。因此,“富人参政”是村民、富人以及地方政府各方经过理性计算的行为,各方均从中获得了利益。”“乡村直选层次的‘富人参政’尚不足以对整个民主制度形成风险,故此不妨多加宽容。”^[3]这是典型的经济利益决定论。在此,姑且不论别的方面,只是以下方面就值得引人注意:第一,经商和为政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性质和思维方式,如果对他们不加区别和分理,那就极容易走上歧途。如经商最大的特点是追求利润甚至是高额利润,有时一点点差别就会导致盈亏和成败,所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基本也是普遍的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表现出来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他还引用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表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P266)}而为政虽然也讲究经济成本,但其更注重宏观效果和公共民意,有时为了让老百姓满意和获得幸福,为政者甚至是不计成本、蚀本、破本的。如杭州市城乡建设的楼居相当宽阔,就是为了从舒适、审美角度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但如果让一个“富人村官”来设计和安排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又如村民自治选举程序复杂,所需的经费也是相当可观的,这让“商人”和“政治家”在实施时恐怕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预算。第二,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贿选及其他腐败问题。我们不能说每位富人参政和治村都是出于经济考虑,事实上确有不少企业家为服务于社会和乡村建设而撒尽资财,但也有相当多的“富人治村”则是起于钱财止于钱财,却也是不可否认的。竞选时有的富人为了当上村官,动辄花数百万行贿与许诺,而一旦当上村官,又尽其所能地贪污敛财,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中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腐败现象。在浙东地区的调查中,有一个富人竟然花了100万元贿赂村民,结果仍然没有当选,因为还有比他更舍得花钱的人。^[5]有人还这样概括说“从目前检察机关的数据来

看,近年来‘富人村官’的腐败犯罪现象确实有上升的趋势。以前我们一直说,因为是‘穷人治村’,所以贪污腐败的情况令人担忧,但是现在‘富人治村’了,问题似乎仍然比较严重,而且腐败又多了新的领域。除了先前的贪污、截用款项外,豪赌、充当自己非法交易保护伞等新的情况也在不断出现。”^[6]可以说,不少富人参政、治村的目的很明确,也是相当直白和露骨的,那就是心中有一个“得”与“失”、“投入”和“产出”的计算关系。换言之,之所以许多富人费尽心机、竭其所有参政、治村,说到底,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是为了捞更多的好处和实惠。第三,“经济至上”遮蔽下的无知、无畏、无德、无情式的乡村治理。应该承认,不少富人是全方位的能人,有的尽管创业起点较低,但通过商场这所“大学”的陶冶与洗礼,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不过,也应该承认,不少富人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品德是较差的,更有甚者,有的富者实际上并无真才实学,其整个的发家史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靠歪门邪道完成的。试想,如果让这样一些富人参政、治村,其结果会如何呢?我们还有望让其有正义感、生态意识、文化眼光和公民准则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不仅来路不明,而且其执政理念与方式都是盲目、短见甚至荒唐的,是一条将中国乡村治理引入歧途甚至毁灭的不归之路。

其实,我们党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由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而这种提法和做法只是某些地方领导的倡导和施行,并不符合中央精神。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7](P12)}

总之,我们不反对让“富人”参政和治村,而是反对只重“富人”之“富”的治村思路,更反对将“富人”当成村官入选的必要前提的愚蠢做法。因为到目前为止,有的地方确实有这样的规定,而有的地方“富人治村”比例则高达60%甚至更高,从而形成一个方向和模式化效应。事实上,我们在村官选用上确实可以考虑其经济能力,并将其

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但更应看重的还是其思想、品质、文化、人脉以及为政能力,没有这些,中国乡村治理是不可思议、甚至是荒唐和可怕的。所以,辩证地来看,让有德、有才、有能的富人参政和治村,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让富人参政和治村,甚至一味地拔高经济标杆,并形成模式化和示范效应,这是不可取的。

二、“富人治村”离不开政府规制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新农村建设,是离不开“富人”参与的,更离不开“经济”维度的注入及其考量。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及其广大的农村不要说无法成为世界强国和获得长足的进步,就是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中的生存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尤其是农民致富的根本原因。然而,凡事都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甚至多面,也要有悖反、双刃剑、相生相克的辩证思维和理解,尤其是在“富人治村”这一问题上更应该如此。我认为,在中国发展尤其是乡村治理中,充分调动富有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潜能,这是对的;但也不能随意而为和放任自流,政府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对“富人治村”要有相应的管理和制约。这样,方能做到取长补短,更好地发挥“富人”及其各阶层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以往,许多人总是不加分析地一概批评和否认中国各级政府在乡村治理尤其是在村民自治中的主导作用,以此来证明中国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缺乏民众基础和自治性质。其实,这是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因为不考虑中国国情而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与模式来看待中国,势必造成不切实际的照搬套用,甚至成为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笑柄。纵观中国的历代改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的推力,没有政府的指导、宣传和推动,要在地大物博、复杂多样的中国乡村实行根本的改革,且令其健康发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村民自治何以能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极其广大的乡村生根、开花、结果。

然而,对待“富人治村”却并非如此,除了少数政府领导的关注外,它更多的是一种随意运行状态,而且即使得到某些领导的重视,也缺乏合理的价值引领和科学的制度规范^①,这就带来了其管理无序、随意甚至混乱。我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即使倡导富人参政和治村,也应将之视为乡村治理中的初级阶段,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村庄,注重选拔那些经济能人治村,尽快地将村庄经济发展上去;但村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要注重对村庄管理者的德、才、能和文化素养的综合考量,从而走向更重文化与现代性的科学发展之路。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处于初级阶段的“富人治村”缺乏文化眼光和环保意识,那么他无视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恶性开发,将是无法补救和挽回的,所以初级阶段的“富人治村”也不可忽略甚至无视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维度。

到目前为止,“富人治村”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而在浙江省尤甚。在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浙江省义乌市新当选的761名村委会主任当中,“经商”、“办厂”的有531名,比例为69.99%,接近70%;在新当选的1545名村委会委员当中,“经商”、“办厂”的有768名,比例为49.7%,接近50%。^[8]2009年,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②应该说,在当下“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有效发挥对乡村治理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既包括理念层面,还包括选举、使用、监督、奖惩等制度建设层面。我认为,在以下方面政府应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第一,有关选举政策和法规应体现公平和平等理念,充分保障广大村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鼓励有德、有才、有威望的经济能人参与选举和治村,但对无德、无才、无威望的经济能人要有所限制。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具体而言,一是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如避免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富人“一身兼”,从源头上防止“富者村官”

①有的地方政府还明确规定“村官”的经济门槛,如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纳税则可以当官;又如江苏省射阳县硬性规定,担任村官者的年收入必须达到5万或10万。见《富人治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2009年09月12日新民网。

②《富人治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2009年09月12日新民网。

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任意妄为。事实上,现在不少村庄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由一人兼任,这是无法制约和限制“富人治村”的。二是健全村务管理制度,使“富人治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如有的富人村官在任期间多忙于自己的生意,而对村庄事务并不上心,有的甚至在村庄呆的时间较少,并将村庄公章交由父母代管和盖章,而且要盖章成功还要向村官的父母送礼,即“意思意思”^①。这样的“富人治村”,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就可对“富人治村”起到约束作用。又如健全重大村务公开,实行民主协商和共议制度,也会避免“富人治村”一人说了算的偏颇。2004年6月23日,浙江乐清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外出村两委主要干部委托代理制度”,但因制度的制定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从而致使该制度成为人们的笑柄和不可思议的怪胎。这项制度规定,对因私连续外出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可实行正职委托副职代理职务的制度。^[6]很显然,这为“富人治村”打开了一扇便门,因为它不仅不利于对“富人村官”的管理和制约,反而是赋予了他们以特权。第三,加强监督功能、设立考核与奖惩办法,使“富人治村”处于科学的管理之下。当前的乡村治理虽强调村民自治,并且免除了农民纳税的负担,从某方面说是放权于民,减轻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乡村治理中,各级政府管理的缺席和失职,这在对于村干部包括“富人治村”的管理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事实上,没有各级政府的管理和考核,没有相应的奖惩规定,乡村治理尤其是“富人治村”就很容易走向涣散和腐败。因此,我认为,在中国乡村治理包括“富人治村”中,给广大农村以自治的自由,与各级政府对之加强管理和考核,这二者并不矛盾,它是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的关键之所在。需要强调的是,建立村官违规和违法的惩治制度和机制应成为当务之急,这是避免村官犯错和犯罪的最后防线。某种程度上说,对其他方面的犯错和犯罪,国家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和法律予以惩处,而在乡村治理尤其是村官治村中则缺乏相应的、明确的违规、违纪、违法规定,这就为村官腐败

留下了漏洞和可乘之机。尤其是对违规而不犯法的那些事情,如无具体而详细的处罚规定,又缺乏各级政府的监管和制约,村官自然就可毫无畏惧地任意妄为了。“富人治村”中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产生的。第四,加强对村民的民主意识的培育,特别是要强化对村官的培训,教育和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品质、执政水平。其实,乡村治理当然需要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快速致富的经济能人,但更需要德、才、能兼备的现代领导者,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具有民本理念、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治理能力。

当然,我们倡导各级政府加强对乡村治理尤其是“富人治村”的监管力度,并不等于说又要回到传统的行政命令和管理的老路,而是在“放权”令其自治的前提下,强化指导、监管功能,并且其规约和方式也是现代的、民主的、服务式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这就对各级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包括他们必须具备现代的、科学的治理理念和执政能力,否则,他们不仅不会成为乡村治理包括“富人治村”的推动力,还会成为离心力和绊脚石。

总之,对于“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我们党和政府要把握好“放”和“管”的辩证关系,研究和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甚至法律规定,以应对和解决“富人参政”和“富人治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腐败难题。

三、“富人治村”不能绑架民意

“民意”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任何民主都是空洞的,也是靠不住的。在此意义上说,民意成为民主政治的试金石。中国的民主政治尤其是乡村治理也是如此,所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重视“民意”,即党的一切工作都要看老百姓答不答应,愿不愿意,赞同不赞同。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指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9] (P157)} 江泽民也表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10] (P217)} 不过,应注意

①吴鍾昊、胡晨欢《村主任不在村里,公章留给父母保管使用》,新华社南昌2011年10月4日电。

的是,我们对“民意”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因为民意有时是主动的、自愿的,有时却是被动和被绑架的,而即使是主动和自愿的民意,也有可能是被绑架的。我们在让“富人治村”时,当然要充分肯定民意对于“致富”的信任和渴望,这是其大得人心之关键所在;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另一面,即应避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绑架民意,这极容易使村民成为缺乏公民意识和自治能力的金钱玩偶。

“富人治村”有意绑架民意成为近些年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由于现阶段中国乡村经济整体落后的状况,也由于其治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经济至上”倾向,因此不仅使富人有了极高的参政热情,肯拿出重金参与竞选和乡村治理工作,而且使村民乐意接受“富人治村”,这就出现“经济”双向绑架民意的可能与现实。就欲参政的富人来说,他们为了当选村干部,往往采取贿选和提前承诺的方式,以获得村民的选票,结果村民选举在不少地方成了经济力量的大比拼,有人甚至在一次选举中要花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而没有经济实力或经济实力不够雄厚的人自然被排挤于村干部之外。另一方面,许多村民也乐意被金钱绑架,在他们那里,民主与选举的真义远没有金钱和实际来得重要,当一张选票可以得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益时,何乐而不为?可悲的是,不少村民竟然只得到几盒烟、几次饭,就将自己的选票卖掉了。可见,富人通过经济绑架民意的成本有时并不高,民意的获得也相当容易。经济绑架民意的“富人治村”势必造成村民自治功能的消解与乡村治理的涣散。

当然,“富人治村”有意绑架民意还表现在专断的作风上。因为富人财大气粗,他往往将经商的“无所不能”、“果决作风”用于村庄治理上,这就导致“一言堂”和家长作风,这与村民自治精神往往是相左的,也是背道而驰的。以浙江省宁波市甬村的富人书记龚某为例,他在村庄治理中确实为村民做了不少好事,但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民主和平等意识,如“村主任表示,他在处理两委关系上,是以扮演村书记‘老婆’的色彩来给自己定位的。他说要学会与这位‘富人书记’如何打交道,就要学会龚的老婆是如何忍耐龚的”。这

话听起来有些幽默,也是村委会主任站在称许他们的“富人书记”方面讲的;但这位龚书记的专制、霸道和不顾民意是昭然若揭的。试想,连村委会主任对他的“富人书记”都有如此的看法和做法,那么普通村干部和村民会怎样,就更是可以显而易见了。因为除村委会主任外,其他村干部也屈从于龚书记的权威之下,所以他们“尽管有众多不满,但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场合都是失声的”,而“其他的都是大多数沉默的村民,他们构成一个村庄中的政治阶层”^[1]。这就让这个外表看来成绩突出的村庄,隐含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民意”的被绑架和荡然无存,而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精神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无意绑架民意是“富人治村”更为深刻的局限和隐忧。与直接通过经济手段以及专断作风达到目的的“有意绑架”不同,无意绑架民意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层面,即作为村庄话语权掌控者的富人成为乡村社会的成功者和范本。众所周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贫下中农是乡村的精英,而地、富、反、坏、右则是作为敌对力量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不要说“富人治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村民应该享受的权益,富人却没有资格甚至也不配拥有。如今的许多村庄正相反,富人不仅“翻身得解放”,而且成为村民羡慕、推崇和向往的对象,而贫穷者则不受重视,也很难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富人治村”之所以能得到民意和民心,除了经济因素,对“富人”的崇尚更为重要,是富人的“富”让村民应者云集、趋之若鹜,这样,公推选举“富人治村”才能成风。可见,这种乡村精英的变换与转型实际上是民意属性发生了巨变,是村民信仰发生了转向。

难道“富”就代表着乡村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最后目标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村民致富虽然非常重要,但它远没有乡村文化、道德、现代性来得重要,而后者才是衡量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标尺。所以,“富人治村”是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获得民意的,但不可用金钱、承诺绑架民意,更要打破“经济至上”的价值观,从而提升村民的现代思想意识,尤其确立村民的公民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

这就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富人不但不能通过经济手段等有意无意绑架民

意,而是应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更注重村民的公民意识培养和道德水准提升;另一方面,村民要摆脱小农意识和利己主义思想,真正树立村民自治的精神,即充分发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作用。有学者是这样谈“自治”的精神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和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12] (P380)}。果真如此,村民就不会不加选择地相信富人,更不会无原则地被利益诱惑和收买,而是将自己的选举权和自我意识看得更加重要。当然,这与村民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公民意识直接相关。看来,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除了要强化“富人治村”不可绑架民意外,更重要的还是村民自身主体性和自治精神的确立,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乡村治理的内因和根本之所在。

“富人治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和解释不能进行简单化概括,而是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多元的立体结构、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在动态和融通中达到参照和理解。只有基于此,我们才会对“富人治村”有一个客观和

科学的认识,扬长避短,从而使乡村治理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参考文献:

- [1] 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2] [南非]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前言)[A].王英津,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3] 毛飞.“富人参政”应分层次评价[N].燕赵都市报,2004-02-1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林辉煌.寡头政治与中国基层民主[J].文化纵横,2011(2).
- [6] 袁华明.“富人治村”:边走边看[J].观察与思考,2005(8).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8] 杨宏生.探寻义乌农村富人的“治村冲动”[N].中国商报,2005-04-19.
-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1] 桂华,刘燕舞.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视角——基于浙江甬村的政治社会学分析[A].周晓虹,谢曙光.中国研究(总第10期)[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12]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On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the “Rich Village”

Zhao Xiul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Villages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 are a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has recently developed dramatically. Discussions have been held in the academia, and many valuable conclusions, made. However, its researches still stay on an extremely theoretical and superficial level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still lacking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dea, theory and method. In fact, “the rich” can entirely administer these villages, but the government ought not to spread this mode widely. It can release the power back to the villagers to realize their autonomy, but measures must be provided to make effective regulations. In these regulations, “the rich” are capable of using their advantages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villagers, but they may never kidnap their mind. In conclusion, people should emphasize the way of how “villages be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signification and civil awareness.

Key words: villages administered by the rich; dialectical think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scientific administration; civil awareness.

责任编辑:寇金玲